

自主·理解·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许振洲 汪卫华 主编

王逸舟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潘维 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于滨 “西方主义”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

赵汀阳 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牛军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1949~2009）

章百家 中国外交成长历程中的观念变迁

叶自成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

王军 论民族主义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

张睿壮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时殷弘 论当代中国对外战略

贾庆国 顺势而为，量力而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

张小明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张蕴岭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

翟巍 中国与“东盟加”结构：走向适应性共赢

当代世界出版社

10 · 理解 · 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许振洲 汪卫华 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由 理解 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 年 / 许振洲，汪卫华主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 3

ISBN 978 - 7 - 5090 - 0485 - 2

I. ①自… II. ①许… ②汪… III. ①外交史—中国—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7075 号

书 名：自主·理解·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 年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7

字 数：38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090 - 0485 - 2

定 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会议开幕致辞	1
吴志攀教授致辞	2
章百家教授致辞	5
潘维教授致辞	6

第一部分 中国与世界

王逸舟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15
潘 维	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36
于 滨	“西方主义”与 21 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	46
赵汀阳	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68
牛 军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1949~2009)	107

第二部分 中国外交观念

章百家	中国外交成长历程中的观念变迁	131
叶自成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	147

王 军	论民族主义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	168
张睿壮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193

第三部分 对外战略与中国崛起

时殷弘	论当代中国对外战略	205
贾庆国	顺势而为、量力而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	222
张小明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239
张蕴岭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	257
翟 崑	中国与“东盟加”结构:走向适应性共赢	271

会议讨论选录

第一场	中国外交实践	301
第二场	中国外交史	310
第三场	中国外交战略	328
第四场	中国外交战略	348
第五场	中国模式和世界秩序	367
第六场	中国国际秩序观	387
第七场	中国外交实践	411

会议开幕致辞

许振洲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在国庆 60 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 年学术研讨会于今天开幕了。我谨代表主办方向参会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欢迎，感谢大家在暑假的周末能够拨冗出席。王缉思院长因为今天在主持一个同样重要的会议，不克前来，特别嘱托我代他向各位致意。此外，仓促间我们的招待肯定有诸多不周之处。我作为主办方的代表，也先恳请各位谅解。

建国 60 周年，我国的对外关系有了真正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与以往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我们有大量的经验值得总结。同时，这个世界也在急速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形势，如何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寻求我们的定位，如何认识和坚持我们的国家利益，也都是需要认真总结的。最近这段时间，类似的学术活动有很多。由于我们邀请到的学者和嘉宾都是这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大家可能已经就类似的话题谈过多次。但是我们坚信，大家一定是把自己最精彩的见解留到了最后。我们在这两天里准备聆听各位的高论。我再次代表主办方预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吴志攀教授致辞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各位同学、来宾，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自主·理解·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 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诚挚的祝贺，向各位学者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的年度学术研讨会。前两次会议上，我先后也致过辞，对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变迁、人民共和国 60 年与中国模式等重要的课题发表过看法，也在这里聆听过各位专家的高见，有关论文集和会议的讨论、记录都已经公开出版了，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几次会议凝聚起来的思想共识已经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重要贡献。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研讨会也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在这里学习、聆听和参与讨论，我收获非常大，尤其让我体会到，应该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学风。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情，以中国模式为本位，这样才能做出真正的知识创新，这也是北京大学重要的学术传统。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向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表达我自己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长期以来为我们的学术工作发展做出的努力。

本次会议所研究的主题是 60 年来我国对外关系，对今日而言，中国的外交无疑是国运所系的大事，我们与世界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距离。但是仅仅在 100 年以前，外交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还显得那样离奇和遥远，假如“地球未辟，西泰不来”^①，我们也许仍在严守夷夏之防，仍然相信自己

^①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字西泰，意大利人。明末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编者注

是位居世界中央的天朝大国。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的外交其实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我们的情况。中国的外交史也是中国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历史，对于中国和其他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意义的外交本身就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外交定义为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对外努力，外交不仅仅是国家行政部门比如说外交部的任务，不仅仅是谈判的艺术，还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活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与世界相联系、向外的努力，都将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讲的外交，还要注意能源、环境、气候、就业、金融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最新变化很可能决定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比如说清洁能源、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问题，美国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就认为，当今世界能够领导世界在 21 世纪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必定是领导 21 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2009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大前天，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①，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清洁能源问题以及气候问题的立场。

美国将用十年时间投入 1500 亿美元支持绿色经济或者绿色能源的研究，而欧盟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都在并行发展。可能在个别技术方面，欧洲和日本还有专门的技术，比如说日本的锂离子电池，欧洲的太阳能，我国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各位读了昨天的报纸就会看到，我们的工业发展还处于中级阶段，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来，这又跟中国的就业发生很密切的联系，一旦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技术差距就从代内的差距扩大为代际的差距，很可能成为被批评和谴责的对象。我们巨额的投资——那些工业制造业的投资——都可能变成沉淀的成本，不可能被收回，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甚至我们的出口也会受到清洁能源的税收或者所谓低碳的法律、排放的要求方面的制约，也将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整整一套发

^①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编者注

展模式都将作出根本调整。这些重大的事情，从外交角度来看也必然要进行研究，提早进行应对。

外交要适应世界潮流，我们必须加入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之中。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路是走不通的。中国的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开放才能进步，但外交又必须坚持独立性。一个大国，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价值体系和健康的心态，实际上它就算不上什么大国，它仅仅是一个强权的附庸。外交必须忠实地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在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指出，“中国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从这个表述我们不难读出许多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今天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发育成熟，现代化进程还在加速进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世界，比如说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以及其他方面。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也依靠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资金、中国的劳动力以及中国的文化。当下的金融危机就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一点。未来的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讨论中国外交，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现代化这条主线。过去60年，我们已经用巨大的代价换来一个比较巩固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我们已经成为现存世界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成员。未来我们还要完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建设，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我们的外交所需要回答的就是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适应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变化，并赶超发达国家——西方那些强国，从而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这样的问题，也当然是请教在座各位学者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我也期待着在讨论会上继续聆听各位精湛的见解。

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章百家教授致辞

今天参加北京大学的研讨会，“自主·理解·合作”，我觉得这个题目选得非常好，这反映了我们中国外交 60 年所经过的历程，而且反映了我们 60 年外交中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这 60 年来，中国外交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是我们的对外关系，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我们跟整个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在变化中也有我们自己一贯追求的理念。对大学和学术界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对外关系研究，从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直接是政策制定的过程，只是少数领导人来专门负责的一个领域，到现在我们有许多的学者都可以坐在这儿讨论中国的外交，讨论我们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我想这也是 60 年来外交发展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在建国 60 周年的时候，由学者们来讨论中国外交的历史，来讨论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讨论我们的政策，我想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而且这次的论文，反映了大家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这里面既有中国外交的问题，有不少还涉及全球性的问题，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环境等等各个方面面临的问题。现在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时中国也是在取得成就之后面临着一种新的形势，可以说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处理得好的话我们发展会比较顺利，如果处理得不好，也可能面临着许多新的障碍。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术界的朋友、大学的教授们坐在一起，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 年，我想这是对我们建国 60 年的最好的纪念。

最后希望研讨会取得成功。谢谢。

潘维教授致辞

国际关系咏叹调

在世界上游荡了半年，刚刚回国。没写论文日程上也就没安排发言。借开幕式机会，谈五个感受，是个关于“国际关系”的“咏叹调”。

—

第一个感受，中国明显成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最大赢家”。有五个标志：

1. 强大的金融实力。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十年前号称在“破产边缘”，如今反而轮到“最健全”的西方金融机构破产。风水轮流转，拜金融危机之赐，中国三大银行（工商、建行、中银）市值排名世界前三，交行第十，第四是以香港为基地的汇丰，即 HSBC, Hongkong Shanghai Bank of China。因为坚强的金融实力，中石油市值与埃克森—美孚平起平坐，一度还略超。因为坚强的金融实力，美元又看软，我国要把人民币推向世界。这是个战略大手笔。20 年后的 2030 年，我们大概能看到与美元、欧元平起平坐的人民币。

2. 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已经星火燎原。比如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拉美第二大（但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南美洲资源型经济的支柱，也是拉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在非洲，举个例子，很少有人注意到刚果（金），卡比拉的民主刚果。那儿打了 10 年内战，死了 500 万人，西方的“国际社会”装聋作哑，却来中国周边的缅甸、朝鲜折腾“人权”。美国今年给刚果 3 亿美元援助，还不肯免掉当年借给大独裁者蒙博托的巨额债

务，可中国承诺给 60 亿美元，主要是铁路、公路，医院、学校。而且这还只是中国在当地开矿收益的一小部分。现在非洲一片繁荣，连赤道边上不到 200 万人口的加蓬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在开矿筑路。那里曾是法国的天下，邦戈总统（原法国空军中尉）自 1967 年执政，今年死了才“下台”，执政 42 年有余。法国所有新老政要都去参加这个大独裁者的葬礼。他把加蓬惊人丰富的矿产资源拱手送给法国和法国政治家，自己的国家贫困依旧。法国在非洲不占道义制高点，炒什么民主人权？中国的非洲政策明显比法国要先进，比欧洲的老殖民国家先进。一番喧嚣之后，欧洲默认了中国在非洲，包括在苏丹的政策。欧盟地位下降，日本经济萎缩，被边缘化了。

3. 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向内需型结构的调整“初战告捷”。为什么说“初战告捷”？外部市场需求一直在萎缩，中国真的是靠内需增长撑住了至少 8% 的高速增长。人们从议论“世界工厂”开始议论中国要成为“世界市场”。

4. 西方对中国体制原有的批判正在丧失影响力。世界舆论对中国体制的调整适应能力非常震惊，从批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转为承认中华体制有独到特点，开始承认中华体制的调适和学习能力。

5. 美国被迫承认了中国世界“老二”的地位。还是因为金融危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20 年后第一大。40 年后是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从三年前提出“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到 G2，Chimerica（中美国），到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到《中国统治世界》成为畅销书，恍如隔世。

二

中国成为经济危机的“最大赢家”引发了我的第二个感受：世界进入了“后极时代”（post-polarity era）。经济危机，奥运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影响力扩大，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朝鲜用半真半假的“核武器”威慑美国，美国开始撤离伊拉克，在阿富汗损兵折将，陷入深度危机。所有这些都在一年内

发生。1991年开始的“单极世界”在2008年就结束了，持续了仅仅17年。什么是“后极时代”？大概有四个特征。

1. 这是个谈不上单极，也不是多极，更不是两极的时代。有强国，但谁说话都“不大顶用”。洪都拉斯向来是美国的掌中物，可政变了，美国说话也不顶用。美国当然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20年后，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两强就比肩而立。那时，若俄国也复兴，就形成三强鼎立。俄国早晚会展兴，至迟到本世纪中就可以预期三强时代。可不管是几强，没谁有能力一锤定音。

2. 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无论两强还是三强，与高度对抗，成固定集团的所谓“极”的时代非常不同，用战争来强迫别国不再是重要选项。今天所有国家的决策者都全明白了：战役胜利与治理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3. 各国有矛盾，有合作，端看焦点问题是什么。就不同的问题，哪怕“盟国”之间也异见纷呈。比如对“主权基金”的看法，欧盟内部看法非常不一致。

4. 内政塑造国际关系，使得国际关系成为缺少“规律”的领域，是个由“不确定性”主导的领域。焦点问题飘忽不定，一点儿都没谱，一会儿冒出一个，每个主题都各领风骚三五年，比如“反恐”概念在奥巴马埃及讲话后走向末路。“系统结构论”带来的确定性是我们学科的思维定式。认识到内政塑造的“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的需要，会改变我们带有“确定性”的学科思维方式。

我们无法料到苏联会垮台，出现“单极世界”；无法料到单极世界如此短命，因为无法料到所谓“反恐”问题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更无法料到“反恐”把阿富汗再次推上“帝国杀手”的地位，英帝国，苏联帝国，美利坚帝国，都在那里栽倒。对我们自己来说，继反恐“越反越恐”之后，突然冒出个“碳排放”问题，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问题，完全出乎意料。国际政治学者不可能提得出“碳排放”的解决方案，就像国际政治学者无法预料和解决塑造了国际关系新时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甚至没想到美国对朝鲜获得核武器能力的问题束手无策，干脆装聋

作哑。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里变得重要了，也看到中国商人在世界每个角落做生意对我国外交的决定性影响，但我们的学科原本是“国际”政治。

三

“后极时代”的国际关系引发了我的第三个感受，当代国际关系取决于国内政治，挑战了我们的学科，使国际政治学科出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被边缘化的危险。反恐也好，中法中澳关系也罢，包括对台关系，还有那个“碳排放”问题，都是内政引发的。我们今天讲授所谓“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一写论文就先上“三大主义”。然而，提出好问题，增强了中国地位的是疯狂奔向全球的中国商人。我并不是说国际关系理论没用，而是想说，在焦点飘忽不定的“后极时代”，警惕教条主义，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各种所谓“主义”的思维定式，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有意义。我们的外交实践、政治思想交流实践、对外贸易实践、招商引资实践、人员交流实践、科技交流实践、军事交流实践、教育交流实践等等，都是塑造中国对外关系的要素，也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根据。起初，国际关系是法学家的天下，国际法学家。后来是地缘政治学家。再后来是比较综合实力的专家。新的时代，要求国际关系领域培养政治通才，对世界事务和各国国内事务，包括对中国国内事务，有广泛兴趣的通才。知识“杂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专家至少同等重要。时势似乎要求我们成为半个金融学家，半个历史学家，半个政治体制学家，半个外国政治专家，半个环境学家，半个文化学家，半个法学家，半个军事战略学家，半个地缘专家，等等。

四

国际政治知识多元化趋势引发了我的第四个感受：多元化有条主线，即

生存方式。争论谁更了解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或许还有用，争论这个那个“主义”的“原教旨”是什么或许还有用，但关注世界各地人民不同的生存方式很重要，对中华文明生存方式的了解和自觉更重要。国际关系有“国家理性”的假设，因此利益分析成为学科确定性的核心。然而，利益是历史的。20多年前修习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课程，我认为他说得对，国际关系就是研究“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但我一直感到困惑，教书时也总提这件事：南美洲国家为什么不打仗？近来跟着顶级的考古学家在那里转了一圈，发现那里从古至今都不打仗，连武器都不造。当然，我说打仗指的是战争，西欧、北美、亚洲、非洲那类的战争，不是南美洲死几十上百人的那种“战争”。不打仗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那里至今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今没人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非洲也没什么民族国家，中东也没有。那么，中国是民族国家吗？中国大概属于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文明范畴。判断强大的国家不属于“民族国家”，对国际关系理论是颠覆性的。人类自古就在盖房子，给自己盖，给人造的神祇盖，给精神世界盖，一座座、一层层。古时候，除掉睡觉，人类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打土坯盖房子。我看今天还是这样。三分之一的工资用来买租房，拼命盖有各种精神符号象征的大房子，与5000年前埃及人修金字塔没什么两样。文明不能简化为“理性盘算”。没有谁不“理性”，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理性是历史塑造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也是历史塑造的。

五

国际关系要从文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这引发了我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感受。在核武器时代，世界上的主要生存方式已经不可能用热战手段摧毁了，所谓“国家安全”实际上是生存方式的安全。后极时代是生存方式的竞争。关于生存方式竞争的大战略围绕意识形态展开，围绕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争议展开，是话语权的竞争，是全球化的符号竞争。生存方式被

抽象化、符号化，就成了一种现代图腾。因此，符号争夺成了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手段，成为文明兴衰的原因。冷战是第一场用符号打的战争。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更不是被陆海空军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被打败，损失程度与热战不相上下。话语权的竞争，在思想战线中求独立自主，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我举三个例子解释这个观点，作为我发言的结束。

1.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但我国很多学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把中国看做失败国家之一，或者行将失败崩溃。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受西方学者影响，认为拆掉我们的体制，拆故宫，建白宫，才能避免失败前景。问题是，“落后”的体制若将导致我们失败，那是什么导致了我国的成功？这个问题是关系中华兴衰存亡的国际政治。

2. 从远古的“华不治夷”开始，我国外交传统政策是尊重各国“政府”的自主权，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西方的干涉政策已经导致不断的惨重失败，而我们的政策导致朋友遍天下，几乎没有敌人。可是，我们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却认为我们的政策“过时”了，别人失败的政策反而先进，呼吁服从人家“国际社会”的规则（norms）。比如在苏丹，明明是我们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可就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理亏”。别人说谁是流氓政权我们也跟着说；但更恶劣的政权，因为是美国或者英国、法国的朋友，就不是流氓政权。

3. 没有了话语权，打符号战就吃亏，国际政治日程就被别国左右。学者把自己不可能理解的事，当做本学科最大、最值得探讨的焦点问题，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碳排放”就是这么件事。气候变化无常，突然变暖变冷，近两千年史不绝书，连专业气候专家们也不敢断定人为因素到底占多大成分。而且，大气层里的碳是个积累了若干个世纪的东西，碳排放量几十年里也不可能下降。我不是说不该“减排”，不该使用绿色能源、环保技术。但有人为了种种目的，把这事炒作成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国际政治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扎堆讨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或许该认真探究为什么突然冒出个“碳排放”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炒成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我们怎么把“人权高于主权”的事儿给忘了？怎么不去炒作跨国界的人员往来是消除世界贫

困的根本方法，更是当代超国界的“基本人权”？答案当然是“美国欧洲不可能同意”。我们不同意的事他们怎么就炒作呢？不同意才需要“炒”。把一个符号炒作起来，影响国际政治日程，是国际政治的大本领。暂时不具备这个本领不要紧，但要警惕在日程安排上被忽悠，丧失原本有限的话语权。

这就是符号时代的意义。虚拟经济左右实体经济，跨国界的符号政治左右实在的国际交往，左右文明的兴衰。

拉里拉杂谈些感想，与交响乐不能比，有感而发的“咏叹调”而已。谢谢各位，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